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蒋和胜 孙明茜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循环体系和区域发展差距的动态演变,是外国资本、国际市场拉力和国内政策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利用外国资本和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取向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克服资本增殖过程所固有的狭隘性,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十四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构筑合理的国内分工体系。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逻辑关系;合理分工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2.04.02

一、引言

效率和公平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效率目标主要体现为区域经济的极化增长,公平目标主要体现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效率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体现,而公平是发展的导向,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发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内涵有了更高期盼,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亟待进一步攻克。现阶段,站在新旧阶段更迭的历史关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2020)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眼于构建自主独立的国内市场,增强国内经济循环,这必然要求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全面科学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使之在实践中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是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厘清的基本理论问题。

二、文献综述

本文将在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探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研究主要与以下两方面文献相关:第一是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统计测

收稿日期:2021-10-27

作者简介:蒋和胜(通讯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孙明茜,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算。目前有关评估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关联程度的研究较少,陆江源(2020)通过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比例关系,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循环创造的GDP比重不断提升,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竞争力也大幅增强。学界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定量分析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出发测算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际程度。程大中(2015)利用投入产出表从总体和行业的角度综合考察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中国价值链生产和世界各国紧密相关。高敬峰和王彬(2020)基于国内区域分工视角,度量了各省市融入国内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检验了二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余泳泽等(2019)评估了城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探讨了这一参与程度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统计测算的已有成果主要是分析国内特定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覃成林和崔聪慧(2019)利用2001—2016年的区域数据测度了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程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及特征。此外,少数学者研究了价值链分工对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探讨了国内价值链对区域技术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国内价值链贸易对于缩减区域贸易的技术差距具有主导作用。

第二是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已有文献主要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背景及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作了阐述,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实践建设规律的总结升华。洪银兴和杨玉珍(2021)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分工理论,提出应从需求端、供给端及外循环角度发力支撑新发展格局建设。此外,部分学者基于其他视角对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了分析。黄群慧(2021)立足工业化视角,探讨了建立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支撑、内涵特征及政策规划。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基本内容、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阐释。曾坤生(2000)从动态角度出发,研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理论逻辑及主要内容。陈秀山和杨艳(2008)论述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演变、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组合。刘志彪(2013)将国际贸易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出口导向贸易、全球价值链及国内价值链对地区发展差距具有重要影响。柳建文(2017)强调了区域间治理结构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建立区域间治理机制的实践路径。另有少数学者探讨了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安虎森和汤小银,2021)。

回顾现有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二者的统计评估、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发展趋势及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但利用数理模型评估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往往局限于表象,无法深刻总结、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聚焦于地理交通、要素禀赋、经济全球化以及产业转移等角度,以此来解释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过程,缺乏对二者之间具体分析。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联系国内国际经济现实,在分析中国经济循环体系和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演进逻辑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生产理论,将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加深对二者以及二者关系的科学理解,为增强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效益提供参考。

三、中国经济循环体系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循环体系、区域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差距发生了复杂的动态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随之不断调整完善。

(一) 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下的生产力空间平衡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党和国家对国土空间的布局取向开始从革命抗战转向生产生活。以《论十大关系》为理论引领,中国开始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建设道路。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水平极度落后,并且生产空间布局高度集中,全国 67.3% 的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苏少之,2001),内地工业发展水平极度落后,部分地区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这种极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仅不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面对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这种布局也不利于中国的国防建设。鉴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内地发展需要,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对内,集中资源要素在内地开展工业建设,特别是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国家进一步开展“三线建设”,导致生产力布局大幅度向西倾斜;对外,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迟缓,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完全自我封闭状态,1978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足 10%^①。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背景下,中国长期实施的偏向内陆地区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在客观上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国内生产空间布局,为内地提供了发展基础,缩小了内地和沿海的发展差距。然而,片面追求公平的均衡发展战略并不等同于高效高质量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低效低质量的公平。

(二) 以国际经济循环带动国内经济循环的区域非均衡发展

为了摆脱贫困,中国的理性选择首先是发展经济。1978 年 12 月,党和国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对内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空间生产布局,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支持优势地区先富带后富,中国主要采取了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黄阳平,2010)。对外主要表现为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and 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扩大开放范围,进行渐进式开放的实践探索,拓宽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空间,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导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尤其是在 1990 年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面对跨国资本流动和产能转移加速的历史机遇,中国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一步嵌入国际经济循环。2000 年,中国东部对外依存度达到 65% 的阶段高点。^② 在地理优势和倾向政策的推动下,通过引入外资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也越发明显。1996—2000 年期间,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地区人均 GDP 差距和地区生产总值(GDP)差距均在不断扩大(见图 1)。

(三) 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弊端与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

2000 年以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开始迅猛发展,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随之不断走高,2006 年达到峰值。外贸加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大,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经济循环的主导地位。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 and 区域发展水平,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弊端逐渐显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依附性”的低端定位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较弱,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现象。2003 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人均 GDP 差距扩大到 2.76 倍,而地区 GDP 差距扩大到 2.68 倍(见图 1)。各区域的非平衡发展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圈地发展、生态资源过度损耗和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隐患,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对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党和国家及时调整生产空间布局和发展战略,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政策局部牺牲效率(刘秉镰等,2020),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图 2 给出了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差距演变情况,可以看出,观察期内,中西部地区财政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并且在2000年以前,区域之间的财政干预差距总体上较小且保持平稳,2000年以后差距逐渐加大,这也印证了财政支出对缩小区域差距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政府政策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红利衰竭和土地成本上升,东部地区的部分加工制造业开始转移至中西部地区。2003年,东部地区GDP增速开始整体低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人均GDP差距和地区GDP差距均出现拐点(见图1),此后,区域发展差距开始有所减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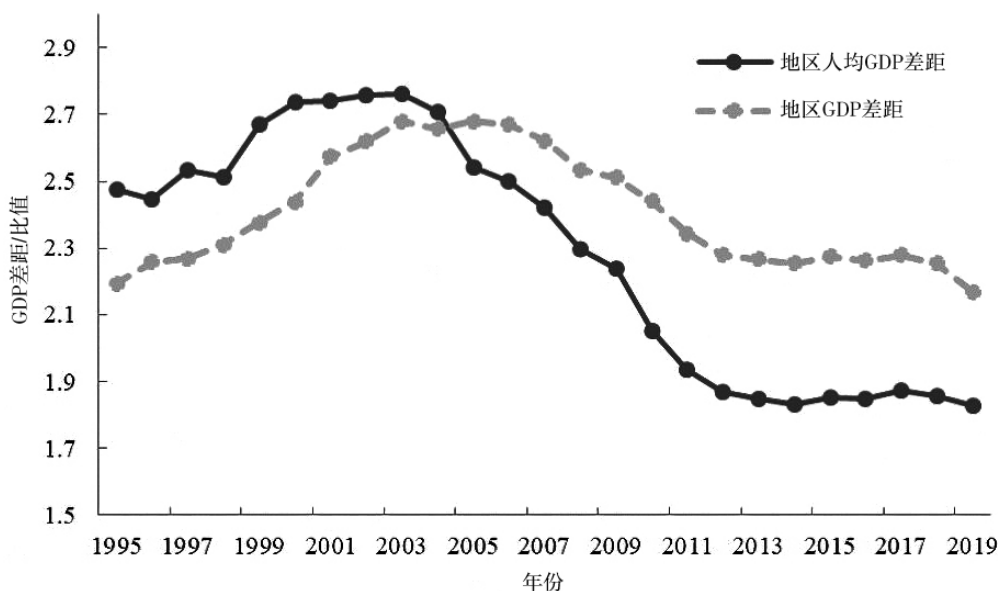


图1 1996—2019年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变化趋势

地区人均GDP差距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比值,地区GDP差距为东部地区GDP均值与中西部地区GDP均值的比值。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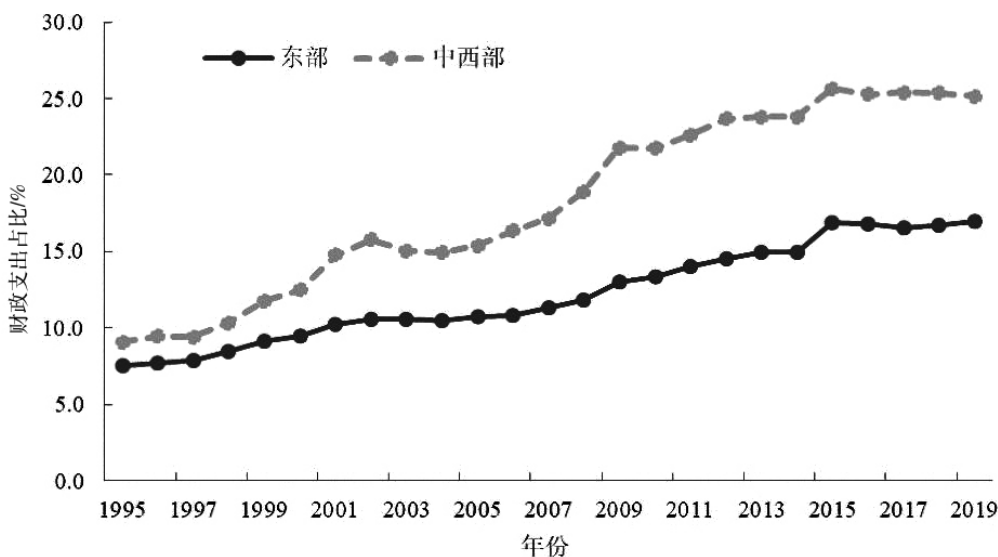


图2 1996—2019年中国东部、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四) 中国经济循环体系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加工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究其原因,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冲击是直接因素,但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循环体系的失衡。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经济循环,国内产业基础薄弱,导致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较弱。对此,党和国家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循环重心逐渐转向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党的十八大以后,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低迷,由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崛起威胁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霸权,加剧了其国内矛盾,促使“逆全球化”浪潮不断蔓延。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内需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大幅增强,然而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仍然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空间生产布局,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战等,提高了政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加大了对贫困落后区域的支持力度。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2017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见图1),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习近平,2017)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而国内经济循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低至49%,中国开放格局逐渐向内陆腹地扩展,中西部地区的地缘优势逐渐凸显。2010—2019年期间,中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从10%提升至12%。^①

(五)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打破了原有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全球资本循环体系受阻,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形势愈发暗流涌动,中国外部发展环境不断恶化。中国不仅出口面临国际需求大幅下滑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技术断供的威胁。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注重国际经济循环转向注重国内经济循环的进程。2020年5月,党和国家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循环体系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高水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区域发展效益不断提升。然而,在新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区域发展不协调的表现更为错综复杂,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区域流动布局,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均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分化和结构性失衡趋势,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仍需进一步优化。

四、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的资本逻辑与中国经济循环体系的转变

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循环体系转变和区域发展差距之间的内在张力。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演变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在资本作用和政策作用下的耦合统一。本文将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生产理论对区域发展差距的背后实质和中国经济循环体系的转变进行解释。

(一) 资本张力与区域差距的形成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过程,近现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纵深推进、世界分工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区域发展差距的动态演变,本质上都是空间资本化的表现。“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发掘、生产并占据新的空间,是资本主义缓解其内部基本矛盾、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时,深刻意识到了资本的空间重组、同质化趋势以及空间不平衡发展之间的逻辑张力。“资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对利润的追逐迫使资产阶级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发展,不断突破地理空间等自然障碍对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限制,“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通过拓展新的经济空间和形成新的劳动区域分工,资本能够利用国内外资源,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分散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从而吸收、容纳生产力的扩张,缓解内部危机。在资本的推动下,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深入发展,整个地球也被卷入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中,各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日益深化,从而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在此过程中,各地区、各国的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都将或快或慢地被纳入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劳工套利”的方式,从广大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汲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d)空间交往是各民族和各国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而对外交往的程度又决定着其内部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论是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还是区域或国家内部的空间不平衡发展,本质都在于生产不平衡上。“地域的广阔无限,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它也许会寸步难行。”(布罗代尔,1997)资本不断打破旧的区域壁垒和空间限制,开拓新市场进行空间修复,世界各国的交往范围也因此不断扩大加深,这一交往、扩张过程也是一个按照资本逻辑重塑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过程。换言之,空间不平衡发展和资本扩张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资本主义包含着不平衡发展的必然性,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外在表象,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外部反映,背后隐含着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征服与利用。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是以空间的各种不均等性为先决条件,全新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是建立在地理空间、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主义对超额利润的追求,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创造的价值会流向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不平等交换也必将加剧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即空间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前提。

(二) 资本逻辑与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共同塑造

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积累水平不足,难以发展现代产业部门,因此,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导带动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然选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等发展优势,积极吸收、利用国外资本和技术等稀缺生产要素,主动融入国际资本循环体系。然而,在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位于“微笑曲线”底部位置,进行的是微利化、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代工(刘志彪,2010),这种“依附性”的低端定位必然会导致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

中国区域之间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差异巨大,市场力量必然会导致区域之间的价值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速度存在差距。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整体利润率更高,投资环境更好,自然会成为跨国资本的投资重点,在更高的规模上进行积累,进而形成积累中心。另一方面,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由于流动资本匮乏、交通区位优势、劳动报酬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等状况,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剩余价值率较高。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这种生产上的差距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具体而言,要素流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占据了中西部地区生产的部分价值量,从而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积累基础。要素流出则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造成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萎缩,从而减缓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发展速度。此外,资本不仅会

重塑区域经济空间,还会对社会文化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经济集聚,会强化资本积累过程的路径依赖和“累积循环”效应,并不断改造空间生产生活环境,以适应资本循环和价值增殖过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先发地位,在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投资,以及人才吸引等方面更具优势,会进一步加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外流,抑制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因此,偏向中西部地区的积累过程很难存在,使得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只能以资源、能源输出的方式发展经济,从而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极化”。

由于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不同,各区域的发展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现象。面对资本的强大的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发挥国家的作用,那么落后地区和国家只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泥潭。中国政府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and 空间发展格局。近年来,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空间的相对均衡发展,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随着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弊害的展露和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中国运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践行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发挥其统筹协调作用,因时因势,不断改进完善发展战略和规划。一方面,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以重塑积累过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环境的建设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意志对投资生产的负面影响,从而能够有效改变区域发展轨迹,促进国民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供应链逐步完善,技术吸收和独立创新能力的增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并提供了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早已深刻印证这一点。随着中国 and 世界经济互动循环态势的转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成立亚投行和设立丝路基金等,以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结构,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和空间平衡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关系

从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主要是受到国际资本运动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共同影响。随着国内空间生产布局的调整完善,中国经济循环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二者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那么,新形势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二者之间到底具有何种关系?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同根同源、互依互促

从整体上看,中国利用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区域发展格局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演进关系。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到现在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化认识和实践反思。“十四五”时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同根同源、互依互促。具体而言,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大重要战略决策,二者都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引,都是服务于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盼、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规划。此外,在当前踏入现代化的发展关键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能够更好重塑和培植区域发展优势,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优化空间发展格局,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助力新发展格局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应在全球化中实现“去全球化”,国民经济要进一步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干扰,形成独立的生产体系,走上自主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落后区域才能借助循环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得到更好的发展,区域空间生产布局才能实现进一步优化平衡。

(二) 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目标

一国国民经济体系若要畅通运行,实现持续增长,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必须形成协同互动的态势。从微观维度看,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单个企业资本循环对于构建国内经济循环具有基础性作用。区位特征是影响企业生产的关键因素,要素资源的初始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区域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此外,各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也会影响单个企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从中观维度看,单个企业资本在一定空间内不断集聚,必然会在该区域形成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产业集群。要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保证各个产业部门具有合理的产品交换比例,在循环中顺利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从宏观维度看,加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不同环节的衔接,需要推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从而打破国内大循环的某些堵点、瘀点,更为充分地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从国际维度看,国内产业链体系是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根基,中国要想冲破不平等的贸易分工格局,必须加强空间组织联系和经济功能联系,优化区域功能结构布局,构建更加高效、合理的区域经济循环体系,从而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在此基础上,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参与国内经济循环,进而统一国内国际大市场,实现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动态均衡。

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目标在于区域协调发展,其实质是通过优化区域生产布局,加强国内区域之间的循环合作,促进各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各区域自由充分流动,提高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耦合程度,打通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循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进而掌握主动权,打破资本控制下的不平衡的世界分工格局,实现空间重构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十四五”时期,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施展空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存在和动态变化反映出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仍未畅通,空间生产布局仍需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在向现代化强国的迈进过程中,中国仍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性,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提高落后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国内再生产循环中形成稳定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中国开放格局向内、向更高水平和向更高层次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推动对内开放,整合国内资源,加强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能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塑造新型全球分工格局的互促互进,这就要求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效益,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从而充分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强化对国外高级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为清晰地阐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未来行动方向。此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宏观总体布局,在科学的发展战略目标下,党和国家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将为落后区域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空间,从而有助于区域经济实现动态平衡发展。

六、“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基本路径

不平等不仅是一种分配结果,实质上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因此,不能简单地依靠分配来解决区域空间或全球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关键在于生产上。

(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要想实现自主积累和内生发展,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一个完整合理的国内产

业链闭环体系。相应地,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布局也需进一步调整。为此,必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深化产业区域分工,促进资源要素在各区域合理流动,实现区域之间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形成一个动力强劲、畅通流动、健康协调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进而增强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备性和自主性,摆脱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构建合理的国内分工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任务。放任市场自由主义,缺乏对市场弊端的有效治理,会导致发展轨迹背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政府政策对资本循环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调控,可以有效应对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政府必须更为积极地发挥作用,加强对资本的引导和规制,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中西部地区,从而实现国民经济体系的良性循环与互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违背地理优势,空间性干预资源配置,将资源引导到地理劣势地区支持其建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能在短期内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在长期内,违背比较优势、缺乏内生发展动力的落后地区可能会在价值生产和价值交换过程表现得更为低效。因此,各个区域应立足要素禀赋、发展基础、地理区位等自身优势,有选择地发展自身优势产业。通过建立良性区域产业分工格局,避免产业同质化与恶性竞争,实现区域内部、区域之间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密切配合和高效互动,从而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内生扩张,提升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效益。

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红利”正在不断衰减,部分传统制造业正在逐渐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等相对竞争优势。此外,受益于加工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已整体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基础稳固,人力资源丰富,已具备一定基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创新发展领头雁,在国内经济循环中,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和价值链的中高端,直面国际经济循环,扮演着“高端生产圈”和“消费圈”的角色,是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的坚强柱石。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滞后,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技术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然而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一方面,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地缘优势,结合加工制造业的规模优势,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并将生产端和消费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另一方面,针对部分发展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可依托其现有产业优势,选择性发展与其关联度较高的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业,打造高技术产业集群。因此,整体而言,在国内经济循环中,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链中上游,扮演着“资源圈”和“生产圈”的角色,市场潜力巨大。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根据这些要求,构建合理的国内分工体系,使其服务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助力于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强谋划部署。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合作。多年以来,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竞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自主空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傅勇和张晏,2007),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区域竞争的“收益”开始超过其“成本”,区域产业同构、过度竞争、重复性建设和掠夺性开发等负面效应逐渐凸显,这种增长注定不可持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完整的国内产业链闭环体系必然要求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区域合作可以促进不同区域经济主体优势互补、协同联动,推动区域之间实现动态均衡,从而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但也需要注意,加强区域合作并非否定竞争,协调发展也并非相同发展。区域合作可以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和地区壁垒,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充分竞争,提高企业、区域之间的规模经济效应,形成发展合力和整体竞争优势。为加强区域合作,应在把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职能,深化财政体制和考评体制改革,探索制定区域间协同发展新机制新模式,妥善处理好区域合作中的监督管理、利益分配和价值补偿等问题,提升区域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和联动性。

第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重要创新节点。当前,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威胁着中国的

经济生产安全,国内生产体系必须具备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复杂劳动以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依托,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通过高生产率的复杂劳动,打造新的比较优势,中国可以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创造更多的价值。从区域产业布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协同,东部沿海地区能够更为有效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实现“内外互动”。目前,原始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和高端人才缺失仍是制约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的重要节点,提升国内产业链的稳健性和独立性。应整合国内和国际的人才、技术及资金等要素,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完善创新投融资政策体系,鼓励市场主体进行合作创新,加强产业链创新衔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渠道,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第三,培育中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中西部地区之所以相对落后,是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些区域不具备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从长远来看,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更高的资本积累或投资水平,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支柱产业。强化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供需对接,才能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内需市场,进而摆脱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财政援助高度依赖的局面,实现内生增长。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或投资水平,激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要以政策刺激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机遇,弥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劣势。在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上,应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建立更为长效的对口援助政策,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为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集聚创造条件,促进优质资源要素回流中西部地区,引导东部地区传统加工制造业的有序转移。同时,在产业承接的基础上,顺应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在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地区选择性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不断挖掘、拓展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空间,推动中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分工体系和全球分工体系。

第四,完善区域生态分工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合理的国内分工体系不仅是生产物质产品意义上的区域产业分工,也是生产生态环境服务意义上的区域生态分工,而区域产业分工、国内供需对接也与区域生态分工密切相关。从区域分工来看,中西部地区扮演着“资源圈”和“生产圈”的角色,为东部地区提供低廉的生产要素和生态环境服务,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导致中西部区域落后状态自我强化的重要因素。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全部的生态环境服务价值补偿,因此,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在区域之间进行价值分配是十分必要的。完善区域生态分工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制定科学高效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工作,形成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模式,推动跨区域的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此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注重政府规划和引导,加强监管和环境风险评估,完善空间治理,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协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促进各区域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 [1] 安虎森、汤小银,2021:《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探析》,《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
- [2] 布罗代尔,1997:《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07页。
- [3] 陈秀山、杨艳,2008:《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选择》,《教学与研究》第5期。
- [4] 程大中,2015:《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经济研究》第9期。
- [5] 傅勇、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3期。
- [6] 高敬峰、王彬,2020:《国内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与地区经济增长》,《经济评论》第2期。
- [7] 洪银兴、杨玉珍,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经济学家》第3期。

- [8] 黄阳平,2010:《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中国经济问题》第 2 期。
- [9] 黄群慧,2021:《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4 期。
- [10] 刘志彪,2013:《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11] 柳建文,2017:《区域组织间关系与区域间协同治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政治学研究》第 6 期。
- [12] 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2020:《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管理世界》第 2 期。
- [13] 刘志彪,2010:《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与对策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第 1 期。
- [14] 陆江源,2020:《从价值创造角度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代经济管理》第 12 期。
- [15]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875 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5 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2009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69 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2009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20 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2009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70 页。
- [20] 裴长洪、刘洪愧,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 6 期。
- [21] 覃成林、崔聪慧,2019:《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评估及其提升策略》,《改革》第 2 期。
- [22] 邵朝对、苏丹妮,2019:《国内价值链与技术差距——来自中国省际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 6 期。
- [23] 苏少之,2001:《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 1 期。
- [24]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 月 28 日第 1 版。
- [25] 习近平,2020:《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8 月 25 日第 1 版。
- [26] 余泳泽、容开建、苏丹妮等,2019:《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 230 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中国软科学》第 5 期。
- [27] 曾坤生,2000:《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中国软科学》第 4 期。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JIANG Hesheng, SUN Mingx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s economy,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international market pull, and the domestic policy thrust. On the one hand,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nd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develop its economy have resulted in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us widen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centred socialism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resulted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gional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thereby mitigating the inherent narrowness in the capital proliferation, and reducing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imed a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thus form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full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embedd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develop an efficient domestic labor system.

Key Word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harmon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logical relationships; efficient division of labor

[责任编辑:张兴祥][英文校对:杨子砚]